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1.010

# 乡村日常的诗意建构

## ——析韩少功《山南水北》

周爱华<sup>1,2</sup>

(1.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与信息系, 浙江 杭州 311231;  
2.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韩少功随笔集《山南水北》记述了其迁居八溪峒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乡村的所见所闻, 在乡土叙事中阐发对乡村生活及村民生存状态的审美体验和形而上思索, 同时表达出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山南水北》是作者韩少功对抗焦虑的产物。关于缓解焦虑之道, 韩少功的策略, 其一是回归乡村自然, 回归土地劳作, 以此安放身心; 其二是从事文学创作, 使日常生活审美化。

**关键词:** 《山南水北》; 乡土叙事; 生存焦虑; 回归自然; 日常生活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1-0064-07

**引用格式:** 周爱华. 乡村日常的诗意建构: 析韩少功《山南水北》[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1): 64-70.

## Poetic Construction of Daily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Analysis of Han Shaogong's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ZHOU Aihua

(1.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 Zhejiang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Hangzhou 311231,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m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Han Shaogong's volume of essays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describes his daily life of living in Baxidong and what he has seen and heard in the countryside, and expounds hi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metaphysical thinking about the village life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local narrative. At the same time, he expressed his boredom with city life.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is the product of Han Shaogong's struggle against anxiety. On the way to alleviate anxiety, Han Shaogong's strategy is to return to the natural village, and return to the land to work, so as to rest the body and mind; the second is to engage in literary creation, so as to make daily life aestheticized.

**Keywords:**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local narration; survival anxiety; returning to nature; aestheticization of daily life

收稿日期: 2018-09-15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及奖励项目“突破与新变: 新时期湖南文学的新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研究”(17JD56)

作者简介: 周爱华(1979—), 女, 湖南湘潭人,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韩少功长篇随笔集《山南水北》遵循着内在的脉络，从决定返乡、在乡下选址盖房，到开荒种地，再到逐渐融入乡村生活，参与乡村事务，记取乡间趣事、轶闻传说等，全篇无关宏大叙事，是关注饮食起居、鸡鸭猫狗、娓娓道来的日常叙事，叙事中洋溢着还乡的喜悦与诗意栖居的欢乐。作品在写人记事中阐发对乡村日常生活及村民生存状态的形而上思索，所思所感中流露出作者在现代都市和传统乡村夹缝中生存的焦虑。

## 一 田园将芜胡不归

叱咤文坛的宿将、身居要职的文化官员，为何要放弃名利、隐居乡下，这一疑惑构成了读者阅读《山南水北》的期待视野。通读全书，笔者从字里行间觅得以下两个明显理由。

### （一）土地原型的召唤

远古时代和农耕文明时期，人类祖先依靠土地馈赠得以存活，土地是人类的生存之本、立根之基，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深深地扎根于人类心底。考察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国的女媧造人，希伯来民族中上帝用泥土造出人类始祖亚当，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聪慧而睿智，知道天神的种子蕴藏在泥土中，于是他捧起泥土，用河水把它沾湿调和起来，按照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sup>[1]</sup>，人无一例外都由泥土捏造，神话反映出人类对土地的崇拜意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土地意识逐渐内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也是集体无意识，即整个种族的普遍心理的状态与形式，荣格称之为‘原型’，或‘原始意象’。”<sup>[2]278</sup>原型理论认为“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活跃在每个人的灵魂里，某种原型情境在不同时代的作家身上重复发生，因此在历史上会不知不觉地出现众多同一母题的作品。”<sup>[3]359</sup>原型意象是人类初民对其生存状态的诗性反应，虽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其本质却具有很强的共通性。<sup>[4]</sup>

土地成为人类文化文学作品不断书写的母题。至现代，回归、亲近、融入大地更成为西方知识分子试图用来抵抗工业文明异化、挽救现代人文危机的途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我为什么住乡下？》一文中谈到他的哲学思考扎根于乡下生活，他的工作类似于农民在大地上的劳作。

“所有的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突现出来，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扎根于南黑森林，扎根于这里的农民几百年来未曾变化的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sup>[5]</sup>与乡下自由、本真的生活世界相对照的，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主宰下异化的科技世界。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国家，土地作为文学意象或母题反复出现。母题是原型的载体之一。随着时空演变，土地原型超越了自然之属性，积淀了人类深沉、复杂的情感，土地原型衍生出不同的母题，如地母、还乡、家园等。土地原型在文学作品中承载了多重文化意蕴和情感内涵，大致归纳如下：一是土地代表财富和权势，如《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二是对土地上劳作的赞美，如《诗经》中描写稼穡之作。三是回归土地的田园生活，寓示着对官场的厌弃和对自由的向往，如陶渊明《归田园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隐之思激发出历代文人墨客的惆怅和共鸣。四是故土即故乡是游子的精神家园，家喻户晓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游子之思，千载以下，莫不动容。五是对故土爱恨交织的情感，如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后花园》等小说，黑土地上的植被生生不息，土地上的劳动者生死如蚁。六是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依赖于土地收成的生存意味着贫苦，安土重迁同时意味着闭目塞听和思想上的蒙昧、未开化。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引领的乡土小说流派，其一方面是在侨居都市的知识分子对乡土世界的深情缅怀；另一方面又用了现代眼光来重新打量 and 审视乡土，批判其愚昧和落后。

《山南水北》延续了乡土文学传统。荣格认为“艺术家受到创造性冲动的驱使，在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之下创作出了艺术作品”<sup>[2]278</sup>，作者受到土地原型的召唤，书写土地上的山水自然、飞禽走兽和人类的生息繁衍，体现出对大地上一切栖息之物的赤子之心。《扑进画框》中，“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sup>[6]3</sup>《回到从前》借法国

老太婆之口道出“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sup>[6]10</sup>。《开荒第一天》“坦白地说：我怀念劳动。”<sup>[6]36</sup>“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冽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sup>[6]39</sup>直白朴素的语言坦言对土地的眷恋和热爱。

## (二) 知青情结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念念不忘、常写常新的题材。韩少功1968年12月至1974年12月在湖南农村插队落户。知青下乡留下的并不一定是创伤经历，作家这样讲述他的知青生活：“1968年我们知青下乡时，农民是有自留地的，集镇上小型的自由市场也是合法的，我们就经常去‘赶场’、‘赶闹子’，他们并没有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完全被割掉。”<sup>[7]44</sup>“知青下放农村那一段，因为社会阅历的增加，因为农村里的政治控制较松，思想是比较活跃的。那时候读‘禁书’是普遍现象。漫长的夜晚，没有什么事做，读书就成了最大的享乐。你刚才提到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虽然名义上是‘反面材料’，但在一些知青圈子里广为流传。有时为了借一本书可以一个晚上走几十里路。”<sup>[7]49</sup>他这样评价这段经历：“艰苦锻炼对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可能是非常必要的。”<sup>[7]50</sup>从中可以看出，知青生活于他而言不是旁人想象的“阶级斗争”“政治生活”，而是生动活泼、细节丰富、血肉丰满的日常生活。这段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极具意义，“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即取材于他知青下乡的见闻体验。

纵览当代文学史，“知青”叙事、“文革”叙事成为“50后”作家创作或显或隐的题材。作为亲历者，“文革”“知青”成为“50后”的集体记忆，那段特殊岁月中发生的事件给当时的年轻人以极大的冲击，逐渐内化，成为他们毕生难忘的精神事件。在这些精神事件中所凝结成的心理体验，成为“50后”作家个人无意识的一部分。荣格认为，作为人格结构的一个层次，个人无意识“主要是指个人曾经意识到的，但由于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的内容。它由各种情结构成”<sup>[3]357</sup>。时移世易，深潜的知青情结驱使作家对这段历史不遗余力地进行书写，以不同的视角在文字中固执地呈现。

知青生活是作者深切缅怀的过往。《山南水北》首篇《扑进画框》，作者迁居八溪，不仅是因为这里的山水美，更因为这是作者知青下乡的地方，

唤醒了作者的无尽回忆。《回到从前》“当知青的时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sup>[6]7</sup>在厌倦了城市生活的虚伪、功利之后，作家更加怀念知青时期的朴素、单纯的生活。返乡，是对美好人性的怀念，《秋夜梦醒》回忆文革时父亲遭迫害致死，家道中落，不知名的军人、女同学、大同学给予我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拯救，让一度差点当小偷的我重返正途。知青时期的农活并不苦，反倒让人体验到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之境界。《治虫要点》写到：“我当知青的时候，农民还广泛地使用过一种诱蛾灯……我记得当时长空星汉灿烂，大地万灯闪烁，天地间浑然一片童话，恍惚之际不知此身何在今夕何夕。”<sup>[6]41</sup>《老公路》絮絮叨叨地讲述老公路沿途所发生的各种知青故事，作者在今与昔两个时空中穿梭闪回，以老队长的感叹“看不见啦”作结，流露出物是人非的挽歌情调。《老地方》则直言知青生活的地方是自己魂牵梦绕的天堂。

重返知青下乡的老地方，使作者再一次感受逝去的青春年华，唤醒和复活昔日的记忆。更深的意义在于，回忆过往是对生命灵性和真情怀的呼唤，是对现实盛行的工具理性的反抗，呼唤着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实现审美超越。

## 二 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

作者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观照乡村日常生活，“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民是典型的、纯粹的日常生活主体，他们终生被封闭在家庭、村庄、山沟等天然共同体中，这是他们所十分熟悉的、安全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sup>[8]341</sup>在他的眼里，八溪峒地广人稀，风光优美；人物个性丰富，生动有趣；农民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他开荒种地，广交朋友，参与乡村事务，被村民尊称为“韩爹”。他认同并融入乡村生活，村民的包括他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成为他的写作之源。其文本中描述的乡村日常生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 (一) 村民最常见的日常交往形式闲谈、聊天

在传统日常生活领域，“语言交谈则主要表现为无信息、无特殊目的、无特定意义的谈天说地、闲聊、闲扯、闲话、闲谈、神聊、神侃、侃大山、吹牛皮、拉呱、聊天、谈情说爱、东拉西扯、饶

舌，等等。”<sup>[8]144</sup> 日常语言交往具备自在性、随意性和非实质性的特点。作者在村民的闲聊中捕捉文学的因子，加以善意的调侃，或给予理解的同情。乡间奇闻趣事多是以谈天说地的形式表达出来，极富地域色彩和神秘浪漫的气息。《十八扯》实录农家火塘边的闲聊，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说、传闻、小道消息等，展示出一个灵异、荒诞的民间世界。闲聊让日常生活主体进一步陷入“沉沦”状态，同时让他们得到日常体验的一般性满足。《意见领袖》绪非爹善于神侃，对国际时事、乡村事务都爱发表自己的“高论”，但囿于学识的浅陋，闹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当年的镜子》庆爹上门闲聊，聊出了一个奇异的故事：一位冤死的女子尸身已腐、心脏犹活，诬告者最终离奇地死去。故事折射出恶有恶报的民间伦理。关于男女间的趣闻往往是村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寻找主人的船》得建伢子向我讲述胜夫子的家庭“趣事”。胜夫子老婆外出打工谋生，带回来一个有钱男人。丈夫失去了做丈夫的权利，还得要热情地款待妇人和野男人。这段闲聊类似于沈从文《丈夫》中的一段情节：乡下来的丈夫让船上的女人伺候有钱的主，一边还得陪着笑脸。作者以实录的笔法隐匿起自己的情感评判，采用的是零度叙事。文章后续交代了胜夫子凄惨的结局，以船的有情来反衬人心的荒凉，这是一出“几乎无事的悲剧”。

### （二）礼尚往来的人情世界

“农业文明条件下的人尚未建立起自由、平等、自觉、开放的非日常交往，而是作为自在的日常生活主体而进行着基于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和天然情感的日常交往。”<sup>[8]282</sup> 这种人际交往具有自在性和日常性的特点。《李家兄弟》讲述李有根招待法国客人的种种趣事，其淳朴好客中有着乡下人特有的狡黠与世故。《乡村英文》讲乡村女人之间的情义纠纷。“玉梅是一个热心女人，与左邻右舍处得很热闹的。”<sup>[6]93</sup> 开篇第一句点明女人的性格，“热闹”一词生动活泼，带着善意的调侃。玉梅把宁静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让人忍俊不禁。《老逃同志》中，战争年代留下的“逃兵”瘫痪后，非亲非故的村民轮流照顾他，直至他入土为安。这是扶助弱者、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面子》中村民日常交往无原则和非理性，圆滑是村民的处世之法。作者设身处

地，对这些行为给予理解。《带着丈夫出嫁》中，一个女子两个丈夫，两个男人之间有来有往、有情有义。村民并不是从一夫一妻的伦理道德规范出发去谴责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只是把这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给平淡的生活增添点佐料。《邻家有女》中，谷爹变着法子炫耀女儿从城里带回的礼物。作者用心体察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作品中折射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夜生活》写的是一双新袜子引出的闹剧，全文喜剧色彩浓烈。《一块钱一摇》写乡下人卖板栗，用“摇”来计价，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从事经济活动的“理性人”的利己原则。作者洞察幽微，从日常交往中窥探村民的内心世界和奉行的“潜规则”。

### （三）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基本形式

“食色，性也”，日常饮食消费与性、生殖是人的本能。消费本能是“人与生俱来的占有与消费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欲望、需求和本能”<sup>[8]57</sup>。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是日常生活最基础的层面。《山南水北》大量篇幅写到乡村衣食住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乡村日常消费发生了大的改变，但农民固有的生活习性和消费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导致不时出现一幕幕颇为尴尬的场面。《准制服》中，本适用于正规场合的西装成为乡下人的平常着装，为了方便干活，乡下人不得不对西装进行乡村式改造，显得不伦不类。经济状况大有改善，讲实惠、贪便宜的消费心理依旧，老五买衣不追求合身得体，而是想多谋几寸布，“大号小号都是一个价。我拣大号的买，合算！”<sup>[6]27</sup> 《豪华仓库》中，村民斥巨资盖楼宅，用来装农具杂物，豪华仓库称得上是村民“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最佳代言。

品尝过现代城市生态恶化带来的苦果，作家对乡村纯天然无污染的农产品倍加珍惜。《红头文件》详细罗列自种的蔬果收成，吃不完当礼品送给城里的朋友。《CULTURE》把自产的蔬果与市场出售的作比较。前者不仅果腹，还带有情感的温度，让人联想到《小王子》里因小狐狸倾注了心血而格外珍贵的那枝独一无二的玫瑰。《瓜菜》中，瓜菜是农家的寻常之物，看似随意的赠送，其实是农妇之间特定的情感交流；对于好逸恶劳者，村民格外宽容大度。

路对山里住户意义重大，文中谈到“路”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是在心理层面，事

关村民的自尊自信。《蛮师傅》中,资金短缺并没有难倒村民,他们用“蛮干”的方法开山碎石,修筑道路,体现出民间的生存智慧。《欢乐之路》中,村民集体修路就像狂欢节,释放出尼采所谓的酒神精神。“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再次得以巩固,甚至那被疏远,被敌视,被屈服的大自然也再次庆贺她与她的浪子人类里言归于好。”<sup>[9]</sup>

#### (四) 传统习俗

传统习俗指“通过人类自在的实践长期积淀下来的、世代相袭的、人们自发地按其行事的特定的行为模式、心理定势、规范、信仰、礼节,等等”<sup>[8]43</sup>。作者深入民间,结合自身体验,对世代相沿的习俗进行重新审视。《守灵人》从农历七月半接鬼祭祖的习俗展开联想,对生男孩以延续香火的传统思想给出了贴合民情的解释。《中国式礼拜》认为农村相比城市犯罪率低,原因在于传统的祭祀仪式起到了道德监控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开会》中,村组大会是乡村的惯例习俗,不同于现代企业办公会议的正规和程式化,村组大会更具灵活性。为了服众,贺乡长从骂娘说起,掌握了话题优势,最终以“理”服人,通过了会议决议。乡长的论辩虽显得滑稽好笑,但他的“理”符合村民认知水平和乡村伦理。《非法法也》涉及的是道德与法律冲突时该如何抉择的问题,这也是困扰现代人的难题。文中电工遭遇事故,村民却没有追究处于弱势地位的肇事者的责任,而是向强势的供电公司索赔。村民秉持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自发按照乡下人的行为模式来解决此类纠纷。

#### (五) 草木禽兽的灵异世界

乡村日常接近自然,与自然存在物共生共长。在日常精神世界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理性精神,而是一些自在的文化因素或图式,如经验和常识。可以说,乡村日常精神世界是一个相信神秘力量的非理性世界。万物有灵,冥冥之中有因果,这种神秘主义的日常思维给自然存在物裹上诗意的色彩。《再说草木》中,草木各有心性,牵牛花敏感,月季花娇生惯养,阳转藤缺德,橘树会看主人的脸色;植物开花、受孕、结果时忌讳人的指点,油菜和楠竹具有超强的侦测能力。《蠢树》中,葡萄脾气大心眼小,因为主人的修剪而闹自杀;

梓树沉稳醇厚,历经磨难顽强地存活下来,却有点儿弱智,分不清时令。

鸡鸭猫狗、鸟兽虫鱼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人与禽兽之间不仅仅是吃与被吃、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还有情感上的交流与慰藉。《养鸡》中,大公鸡享受着三宫六院的幸福与腐败。《小红点的故事》中,不合群的小鸡孤独无助,渴望做一个人而不想当一只鸡。《无形来客》中,狗具备感知无形之物的特异功能。《山中异犬》讲述的是关于狗的灵异事件。狗娘跑去陌生的地方给狗崽送食物,狗用自己的命换主人的命,狗以树枝封嘴安抚客人,等等。《诗猫》《猫狗之缘》《三毛的来去》中,猫狗的可爱情状让人心软,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令人动容。《守秋》写村民与野猪的斗智斗勇。《晴晨听鸟》中,乡村的鸟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叫声有别,不啻是鸟的天堂。鸟会危及菜园,与鸟展开的菜园保卫战别有一番趣味。《鸟巢》中,鸟衔泥结草,为生育后代而不计回报地付出。《忆飞飞》中,“我们”用心喂养不幸落难的幼鸟,痛失幼子的母鸟不胜凄凉。

### 三 在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夹缝中生存的焦虑

#### (一) 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

乡民鲜有进入如政治、科学、艺术、哲学之类的非日常生活领域,他们终生停留在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的惰性和保守性“具有压抑或抑制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的倾向,它往往阻碍人的个体化进程,使人处于一种未区分和无名分的存在状态,处于自然的和自在的存在状态”<sup>[8]297</sup>。《山南水北》对村民的这种“未区分”“无名分”“自然的”、缺乏主体意识的存在状态进行了批判。《垃圾户》中,雨秋是村里最穷的人,扶贫款被他用来打麻将,扶贫物资被他在地上发霉,他情愿过着最不堪的生活。雨秋的生存状态如同动物,缺乏人之为人的精神和物质追求。文本展现出处于封闭状态下的部分底层人性中的劣根性,表达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天上的爱情》中,私奔男女躲在深山生下三个孩子,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爱情在物质匮乏和精神贫瘠下衍变成为动物般的本能繁衍。《“非典”时期》中,封建迷信仍有

市场。在非常时期，一村之长以放鞭炮的方式保平安。《意见领袖》为好议国事、自以为是、见识浅陋的绪非爹画了一幅肖像画。轻松的叙述、幽默调侃的语调，令人忍俊不禁；轻松的文字背后，隐含着作者沉重的叹息和“含泪的微笑”。

随着城镇化推进、工业文明扩张，市场经济意识渗透进村民思想，人心不古，具体表现在：一是村民沾染市侩习气，惟利是图。《一块钱一摇》中，“山里人以前做生意少，就算交易也不像是交易。比如卖瓜论个，不论大小是一个价”<sup>[6]182</sup>；“现在商品交换增多，山里人也大多会精打细算了”<sup>[6]182</sup>。《瓜菜》中，无偿分享劳动果实的慷慨日渐式微，代之以市论价。“妻子”眼馋农户园子里的空心菜，赔上笑脸和好话，仍然一无所获。二是传统文化的没落。《青龙偃月刀》中，民间艺人的剃头绝活被镇上的焗油、染发等时尚玩意所取代，预示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面前必然没落的命运，是为传统文化深情吟唱的一曲挽歌。《雷击》中，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乡民相信不行孝道会遭天谴，为了逃避惩罚，他们在雷声逼近时行孝道。人们一旦能用物质手段保护自己，能用科学知识解释自然现象，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感就会消失，孝道随之衰落。

在乡土文学创作中，沈从文像酉水边行吟的抒情诗人，其笔下的湘西世界有意过滤掉了现实的悲哀与沉重，蒙上一层诗意的浪漫色调。鲁迅是俯视旁观的启蒙者，作品中浙东水乡不乏江南的柔情，但更多地是直面现实的冷峻、犀利，直逼人性最深处。《山南水北》则呈现了湖南乡村原生态的民间生活，带有现实的粗粝和日常生活毛茸茸的质感。韩少功融入民间，观察、思考，使被知识分子话语和意识形态遮蔽的民间在文本中得到再现。在这里，民间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想象，而是血脉相通的共情。诚如作者所言：“我写下这本《山南水北》，也许可以让一些比我更盲目的人，少一点想当然。”<sup>[10]</sup>

## （二）对工业文明下的现代日常生活的批判

对工业文明“物化”的批判是《山南水北》对乡村生活眷恋、赞美的前提。法国思想家博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对当代人生活处境作了深刻批判：“当今世界的物质性使得人们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物质性的人。人类生活在‘物的时代’，因

不断张扬物质生活的合法性而贬低精神存在，而使人日益成为‘物’。”<sup>[11]</sup>《山南水北》对现代生活中的商品拜物教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回到从前》中，“市场化潮流只是把知识迅速转换成利益，转换成好收入、大房子、日本汽车、美国绿卡，还有大家相忘于江湖后的日渐疏远，包括见面时的言不及义”<sup>[6]9</sup>。“炒卖楼宅”，“收罗古玩”，“出国度假”，“对利益关系网络中所有重要人物小心逢迎”<sup>[6]9</sup>。在现代人眼中，物质财富、社会地位等同于人的价值，人内在的精神丰富性完全被漠视。《红头文件》中，“养老金有保证的退休女士们，见面一开口就是钢琴、京剧、合唱团、国标舞、陶艺收藏、MP3以及DV短片制作等等。”<sup>[6]60</sup>这种如美国学者凡勃伦所言的“摆阔性消费”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是出于摆阔的需要。“消费开始由物的有用性消费过渡到物的符号性消费，符号价值替代了使用价值。”<sup>[12]</sup>在这里，艺术成了反精神的存在，沦为炫耀的资本。

《山南水北》揭露了现代日常交际的功利与虚伪。消费主义入侵现代日常生活，使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解体，《回到从前》中，“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频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sup>[6]10</sup>成功人士只关注个人利益，对社会苦难与不公视而不见，“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sup>[6]10</sup>大家心照不宣地说着谎言，排斥异己。“我卷入了20世纪90年代一场思想冲突，不料招怨于一些论敌，受到媒体上谣言浪潮的狠狠报复。”<sup>[6]7</sup>话语中透露出作者对此事的耿耿于怀，以及对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势利、虚伪的厌恶。

《山南水北》展现了现代人异化的生存状态。《月下狂欢》描述工业化时代白领们被机器化的命运。劳动的机械性使劳动者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人成为机械的一部分，人作为感性个体的灵性被泯灭。《隐者之城》描写了怪异的城市景观。这里，人与人之间疏离，人心冷漠，彼此之间丧失了信任与温情，大家相互戒备、互为隐者。城市人习惯于在电视、电脑等数字图像和虚拟空间寻找虚幻的慰藉。《开荒第一天》中，身居显位、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肆意贬低体力劳动、抬高自身身价，其荒谬的论调得到与会者的附和。

《山南水北》也表现出对城市环境恶化的忧

思。《月夜》中,城市的月亮像死鱼眼睛,与之对比的是乡村月夜的诗情画意。《CULTURE》中,城市人远离土地,吃着流水线上的产品,人与蔬果之间的有机联系消失了。《老地方》中,太阳是贴上去的反光荧纸,草木是染成绿色的塑料制品,山水是投影在天幕上的照片。《藏身入山》中,“都市里的钢铁、水泥、塑料等等全是无机物,由人工发明和生产,没有奇迹和神秘可言,几本数理化足以解释一切。”<sup>[6]104</sup>在这些篇章,城市环境与乡村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与人对立的一种异质性存在,后者是与人温情互动的、能带来归属感的存在。《扑进画框》把工业文明描述成梦魇般的存在。“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sup>[6]3</sup>作品集中展现城市的恐惧,传达出作者内心的焦虑。在这里,汽车、空调、立交桥等现代文明的象征符号,演变成压抑人、吞噬人的怪物。

### (三) 夹缝中生存的焦虑及拯救之途

处于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夹缝之中,人会产生巨大的不安与焦虑,《山南水北》是作者对抗焦虑的产物。正如《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度杰出作家韩少功“授奖词”》所言:“他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释放在广大的山野之间,并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为自我求证新的意义。”<sup>[13]</sup>《回到从前》中,“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一番焦急和狼狈。”<sup>[6]8</sup>梦中场景隐喻作者远离乡村故土在城市中生存的焦灼,“我”始终是城市的“他者”。“火车站”喻示“我”一直在路上作无根的漂泊,“误车”隐喻逃离城市、回归家园的失败。“从前”再也回不去了,精神家园已经失落、再难寻觅。《怀旧的成本》中,民间烧制青砖的手艺已经失传,城市里的复古品青砖价格昂贵,青砖已然成为现代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的象征符号。这里,无处安放的乡愁弥漫于字里行间,作者的焦虑与忧思力透纸背。

如何逃避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异化,如何缓解焦虑,《山南水北》实际上给出了答案,即回归

传统日常生活,回归土地劳作,在大自然中安放身心。如何超越传统日常生活的庸碌与沉沦,韩少功的回答是从事文学创作,使日常生活审美化。人们为什么写作,萨特认为,写作是追寻自由,“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sup>[2]363</sup>《山南水北》也给出了相似的阐释。

正因为对工业文明的失望、对都市生活的不满,导致韩少功周期性地从都市抽身出来,回归自然,返回文学之梦,并在那里寻觅到能够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东西。当他用审美的眼光重新打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乡村生活,他发现了诗意,也看到了沉沦;当他在广阔的大自然中自由地呼吸,更感受到都市功利生活的窒息性。他卸下自己用来逢迎社会的刻板面具,在自己的无意识深处挖掘宝藏。这样,在乡村日常生活的书写中,他避免被都市所异化,也超越日常的庸俗,收获了《山南水北》。

### 参考文献:

- [1] 杨丽娟.世界神话与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9.
- [2] 朱志荣.西方文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4] 李红绿.《九歌》中的原型意象及其英译:以许渊冲和卓振英先生的译本为例[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2):111.
- [5] 袁欢.郅元宝:在大时代,读海德格尔[N].文学报,2018-04-12(04).
- [6] 韩少功.山南水北[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 [7] 韩少功,王尧.在妖化与美化之外的历史[J].当代作家评论,2003(3):39-50.
- [8]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9] 尼采.悲剧的诞生[M].缪朗山,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6-7.
- [10] 劳菲.次优主义的生活:对话韩少功[M]//韩少功.山南水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343.
- [11]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43.
- [12]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97.
- [13] 杨庆祥.韩少功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宿命[J].扬子江评论,2009(6):10.

责任编辑:黄声波